

我的青年同事曾向学生推介美国作家杰洛姆·魏德曼的《父亲坐在黑暗中》:儿子一直感到困惑,父亲为什么夜晚总是独自坐在黑暗中,终于有一天,父亲告诉他:“我不习惯电灯,童年我住在欧洲的时候,我们没有电灯”;“开着灯,我不能思考”。——那篇隽永的散文,令很多学生过目不忘。

3月31日,有学生打电话来问候,顺便说一件困惑的事。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起“地球一小时活动”,即选择固定时段熄灯一小时,以提醒人们注意环保。学校通知:“经学校领导研究决定,今晚八点半到九点半教室熄灯一小时,请老师组织同学们在教室观看电影《迁徙的鸟》。”——这位学生问我:学校发这种“通知”算不算愚弄学生?我听糊涂了,为宣传节电而熄灯,怎么又放起电影来了呢?

虽然次日是所谓“愚人节”,但该校一向没有这种幽默传统;再说,学校的一切行为都是教育,校长教师不至于违反常识去愚弄学生。既然非得用熄灯一小时的形式才能提醒学生的环保意识,那最好的方法,莫过于让学生在黑暗中静思,那将是难得的经历。但校方担心学生不安分,担心学生“浪费时间”(一些学校总是不让学生休息,过重的作业负担把学生可怜的时间挤光了),于是有了“两全其美”之策,放起电影来了,于是这“停电一小时”成了笑料。搞这种形式,有可能是为了糊弄领导,应付检查,虚构政绩;然而,这种行为,对学生的伤害是多么可怕!为什么当今一些青年会“什么都不信”?正是形式主义教育行为作的孽!

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,很有必要;但用什么形式,必须考虑学校的特点。学校晚自习时间停电,会造成安全问题,不可不慎。而因为要教育学生节能,就“关灯一小时看电影”,不但没能唤醒学生的节能意识,反而传达了一个错误信息:这类事可以走走形式;有没有实际效果,可以不管。教育者的情操与智慧,是学生永远的灯;而教育中的轻慢与欺瞒,则会给他们的记忆留下黯淡。

建议学校能借此机会请学生就节能问题作反思,提出改进意见,我看有一节课或是20分钟的讨论足够了,关键在于行动。比如,采光很好的教室,白天照样开着24盏日光灯,外走廊上的夜间照明灯上午10点还开着;学校办公室改建时不知什么原因,平均每个教师头顶上有8只“节能灯”,有些办公室的大功率空调整夜开着,经常是因为最后离开的教师“找不到遥控器”……所以,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,学生不大可能通过那一小时的“关灯放电影”而形成所谓的环保意识。

错误的教育比没有教育更糟糕。学生对真善美的追求,对真理的崇拜,往往就被这种极端的形式主义,被教育者的漫不经心与虚伪作风严重伤害。——他们是那么庄重地来参与一项活动,以他们的满腔热情与期望,看到的却是教育者庸俗而无聊的“智慧”。作为受教育者,他们没有能力与学校对抗,只能一次次地失望,直到漠然。等到他毕业,学校给他的这些不良影响很快又会和社会风气“合流”,形成错误的认识,这时再想去改造他,恐怕来不及了。

中学的“北大清华自主招生选拔”,好多也不过是个形式,被看重的仍然是考试成绩与名次,清华北大心知肚明。学校搞选拔,请我观摩评论。其中有个“综合素质考查”,请8名竞争者就一次公益募捐组织活动,分别阐述所任工作的计划安排,在他们侃侃而谈时,我在发愣,——他们各自报出的职务有“总执行官”、“宣传部长”、“财务部长”、“后勤部长”……不过是纸上谈兵,还没干事呢,一堆官衔就封出来了!我点评时,问他们:“你们干嘛要当‘部长’?为什么就不能自称‘小组长’呢?”观众席上的同学们热烈鼓掌表示赞同。可是,这种讲求形式、注重仪仗感,只要做官而不肯务实的毛病究竟是从哪儿来的,难道不该深思么?

即使主事者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与苦衷,但是,学校是培养学生习惯的地方,基础教育阶段教的是常识,关系到人的一生;丢弃常识,养成了坏习惯,是错误的教育。

我真希望所有的中学生都经常能得到一小时或半小时的安静,在黑暗中思考。

苦瓜的藤细细的,叶子也是纤细的那种,有许多小锯齿一样的装饰。它静悄悄地长着,只占了菜园很小的空间。不像南瓜大大咧咧,四处横爬,也不像丝瓜,恨不得占满整个菜地的天空。它就那么静静地,悄没声息地待在菜地的角落里。

苦瓜长出来了,挂在细细的藤上,连着细细的茎,让人担心它们承受不了苦瓜的重量。青青的瓜儿,刻意为自己装点许多疙瘩,显得老成沧桑的样子,可是即使这样

我很想念那一天。我们又回农场砖瓦厂去了。好几百个人在那熟悉和陌生的路上慢慢走着。真的是很熟悉又很陌生了。我们在这里劳动了很多年,生活了很多年,困惑了很多年,也快乐了很多年,那很多年里,我们叫知青。后来我们纷纷走了,这里就一点点变化,变化了很多年,有的房子还在,有的房子无影无踪,有的路还在,有的路已经没有了。我们的宿舍呢?吃饭、开大会、看文艺演出的食堂呢?感冒了发烧了手脚碰破了我们就去配点儿药的医务室呢?我们还有一个每天可以洗澡的很简陋的大浴室,热水在池里,要用脸盆舀了水往头上浇,往身上浇,我们的浴室呢?几百个人都各自看着,想着,找着。几百人没有一个年轻了,可是那时他们全部年轻。那时他们天真、热情、傻乎乎地豪迈,他们真努力啊,忧伤也不可以露在脸上,更不可以写在日记里,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写在了日记里,有一个非常斯文的男生写在了日记里,他们都成了年轻的“反革命”,在后来的所有日子

中国电影皇帝金焰(原名金德麟),韩国人,出身于汉城豪富贵族。金焰的曾祖父是状元,后荣任朝廷大臣;然而他厌恶皇朝内权势倾轧,明争暗斗,决心告退,大隐于市。在汉城郊外创建“理想村”,务农为本,在广袤的土地上播种粮食,收成后布施给贫民;又组织青年,军事训练加强武装,防护外界暴力侵犯。

金焰的父亲金弼淳,生于1878年,学医,创立医院,医术高明医德感人。韩国当时是封建皇朝专政,遭受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剥削,后被日本军国主义暴力侵占,汉城成为刀下鱼肉,民不聊生。爱国爱民的医

生金弼淳,目睹祖国百姓受压迫欺凌,就与几位爱国壮士一起,在“理想村”成立抗日组织,

遭到朝廷和日军通缉。他在1911年10月出版的报纸上读到中国爆发“辛亥革命”,推翻封建皇朝,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重大新闻,顿时热血沸腾,认为韩国人民可以找出出路,向往光明,就于1912年,带全家(妻子和五男二女,金焰排行第三)秘密逃离韩国,亡命到中国。先在东北通化,后移居齐齐哈尔市。他继承祖先遗志,在郊外成立“理想村”,开设诊所,为旅居当地的韩国同胞免费治病送药。因病人多,雇佣助手。可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仍不放过这位抗日的豪门贵族之后,在1919年,串通由日本特务伪装的助手,在牛奶中放毒,将金弼淳害死。金弼淳年仅41岁,正是风华正茂,却壮志未酬含恨离世。

为了逃避日军的追逐陷害,金弼淳的妻子带了全家四散逃离齐齐哈尔,“理想村”就此解散。金焰当时年已十八,为了保护自己,加入中国籍,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。南开中学的师生热爱戏剧。周恩来在南开读书时,曾组织剧团,自己还饰演女主角,登台演出,演话剧成为南开的传统课目,金焰也深受影响,热切希望自己能从事戏剧工作,尚未毕业,就在老师推荐下,于1927年到上海,加入田汉主持的“南国社”,在《莎乐美》《卡门》和《回春之曲》中饰演重要角色,引起上海影剧界重视。田汉介绍他进电影界,先在香港电影开拓者黎明伟在上海创办的民新公司当场记,在1929年孙瑜导演的武侠片《风流剑客》中演主角。

民新改组为“联华”,金焰自1930年起,在23年中共主演了孙瑜和费穆、吴永刚导演的《野草闲花》《恋爱与义务》《三个摩登女性》《浪淘沙》《城市之夜》《大路》《新桃花扇》等23部影片,其中有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,金焰体态健美、英俊清秀、性格开朗、富有思想、青春朝气,是中国新时代青年的表率。在30年代中国电影的男演员中昂然挺立,在中国影片里塑造了出众的男性形象,受到观众爱戴,选举他为中国电影皇帝。

心里

梅子涵

里,成为几乎不开口说话的人,无人理他们,他们也不敢和人接近,每一个白天是怎么度过的?每一个夜晚是怎么度过的?后来,一个男生偷偷地爱上了那个女孩,一个女生爱上了那个男生,他们分别成为那个年代这个女孩这个男生的最牵挂的《天使的翅膀》,亲爱的女孩,亲爱的男生,你们一定要好好爱他们啊,他们比无数人都杰出!

那时的我,有很多颓丧的理由,可是天性蓬勃,只会往晴明里走,可是我的那个广播室又到哪儿去了呢?我看着,想着,找着,我已经连它的位置在哪儿也分辨不清楚。我们知青走了,我们的痕迹也被拆掉和清除,我们只能自己来找找,想想,看看。那是一间只有一个窗的屋子,窗在西面,窗外有一棵小白榆。它多么小啊,七八年的时间里好像没有长过,盐碱的土上,它的生命只



子涵夜话

能细细矮矮,短短的枝条在我开窗的时候会碰到玻璃。我在小屋子很暗的光线下编着稿子,我自己播音,每天清晨,我放《东方红》,对着话筒说:“星火农场砖瓦厂广播台,今天第一次播音现在开始!”中午,我放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,“星火农场砖瓦厂广播台,今天第二次播音现在开始!”晚上,最后一次播音结束,热情昂扬的一天也结束。年轻的梦开始,无限的想念开始,轻轻的呼吸开始,那位写日记的女孩子和男生,开始偷偷流泪。杭州湾的夜晚,在那时,是一首无人朗诵的忧郁的、美丽的、看不见希望的、却天天仍旧乐观的诗。

我还在这一间暗暗的屋子里写作。我真是不太会写,每一句话都幼稚、空洞、却异常真切。美丽的女孩从我的窗外走过,我没想到写下自己的喜欢。那时,很多的情感、想念、纳闷和惆怅都没有想到可以写下,因为不允许写,所以没有想到。

但是我写了窗外的小小白榆。写了它的细细矮矮,那么少的一点儿绿叶,它在盐碱地上几乎不会长高地坚持地活着,我革命主义、浪漫主义地说,我也要像它一样,坚持着在这儿活一辈子,让祖国强大。喜欢文学的女



人老了,会经常念叨那些深埋于内心的事情。即便是处在神志不太清醒的时候,也会有残存的记忆碎片。那些碎片镶嵌着时代气息,有童蒙的单纯、青春的冲动,也有五味杂陈的人生烙印。

90多岁的父亲住院时,老年性痴呆日趋严重。一次去医院探视时,医生告知,老人最近常常表示要吃“百合”。即便是处于半昏迷状态、口齿不清时,“百合”两字也吐露得很清楚。家人为此很诧异,因为在我们与老爸爸相处的几十年,无论是平日的膳食还是日常的保健,“百合”从来没有进入过日常生活的视野,父亲为什么突然要吃“百合”呢?

多亏有个从外地赶来探视的姑姑解开了这个“谜”:父亲当年在京城上学,家道中衰,交了学费之后,就剩下几个铜板。每到中午放学吃饭,穷学生们除了在街边的小摊上买个烧饼充饥外,便是与那些扛活的脚力、拉洋车的车夫一样,到小饭铺里盛一碗热乎乎的“高汤”来润润肠胃,也算是饥饿中的“水饱”吧。所谓的“高汤”其实就是把烧开水倒在一口大锅里,遇上心眼好的大师傅还会往里面撒把盐、加上点酱油醋葱花。这飘着些许油星的“高汤”不要钱,算是给穷人们的一点施舍。于是人们便顺口给它起了很贴切的名字——“白喝”。原来,这就是此时神志不清的父亲反复念叨的“百合”呀!如果没有姑姑的破解,我们绝对想不到“百合”与“白喝”的联系。这的确是个“谜”,一个苦难岁月留下的谜!

父亲住院期间,我的女儿、他的孙女正在澳洲维多利亚大学读研究生。当我扶床贴耳把女儿拿到学位的消息以及孙女的问候,一并告诉父亲时,平日只是微张着嘴、双目总是默默凝视



荷塘战鹭

(绢本水墨)

彭薇

生周宇华帮我漂亮地把它誊写在五百格稿纸上,开拖拉机的喜欢文学的男生周宇波偷偷帮我把它贴在橱窗里,黄昏的时候,我端着饭碗远远地站在角落里看,看有没有人读我的小白榆散文。

我还配乐播送。没有录音机,都是直播,我用三毛钱一张的塑料唱片做背景音乐,“下面播送配乐散文《我和小白榆》,作者梅子涵。”因陋就简的直播和配乐,我不知道感动过谁,被谁记得。

但是我没有坚持在这里。我们都理所当然地走了。我们又很想念地回来。

这时,一直走在我身边的苍蝇说,真是很对不起,我早就忘记了他的名字,他是比我们小好几岁的小知青,是一个油腔滑调的小木匠,他的师傅叫陈海林,可是所有的人都只叫他苍蝇,他突然指着

地上说:“你写的小白榆就是长在这里的!”他又说:“你看,这是广播室的地基。”

我一愣,仔细看看,水泥地基清清楚楚,我说:“你记得小白榆?”

“怎么不记得,你在广播里播,我们都听的。”

我眼泪出来了。我没有想到那么多年前的一篇幼稚散文竟然在苍蝇的心里。

那一天,一直到现在,我都无比想念地记着他的这几句话。我当作家很多年了,听到过别人对我说的话已经无数,可是好像没有一句话超过那一天的这几句。

那一天,你怎么一直走在我的身边呢?难道你知道我会寻找吗?

苍蝇啊,你的名字叫什么?

天花板的他,此时的眼光却忽然灵动地一闪,久不讲话的嘴里竟十分清楚地吐出一个英文单词——“Congratulation!”英文的祝贺?!我当时甚至都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。直到他又重复了一遍,方才释然。我此时好像才理解,为什么父亲曾经告诉我,外语对于他是一座走上新生活的桥梁。上世纪三十年代初,正是因为基督教青年会业余学习外语期间,才使他第一次接触并且认识了“CP(共产党)”和“CY(共青团)”,也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靠着这语言的桥梁,他曾作为中共解放区的代表参加了二战后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工作;也是靠着这“桥梁”,他才能在独立后的黑非洲,代表新中国参与了坦赞铁路的筹建。我可以想象,当这条见证了中非友谊的宏伟铁路建成时,他和非洲朋友曾经说过多少遍“Congretulation”啊!

父亲的一位老战友老朋友踉跄而来,看着已到生命最后旅程的他,老战友干涩的眼角溢出了泪。两个人握着手,嘴角颤动着却无言。微睁着眼睛的父亲还记得这位戎行千里生死相伴的战友吗?我想告诉他,又怕唐突的提醒会打扰人间独有的相慰寄托与交流。突然,父亲好像一下子清醒,身子在病床上抖动起来,他气喘吁吁地使劲摇着对方的手,很急切也很清晰地从嘴里蹦出几个字:“鬼、子、来、了,打呀!”那位老伯也连连说:“打、打……”一会儿,父亲又无力地瘫软下来。看到这一幕,我们几个在场的晚辈都悄然退到门外。只听到屋里那位老伯又大声喊了一句:“我们打胜了!!”

此后不久,父亲就去世了。那年,正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。所有的老人都像时光隧道,与他们在一起,我们会有“穿越”的悲喜与沉思。

十日谈

清明的怀念

明日请读一篇《梨园老黄牛》